

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再考

——灵岩古城与苏州城

陆雪梅 钱公麟

(苏州博物馆 江苏苏州 215001)

It's a sensitive historical question whether Suzhou was the big city of Wu State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to the Lingyan ancient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combined with material data, the big city of Wu State should be Lingyan ancient city.

Key Words Suzhou city Late time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ig City of Wu State
Lingyan Ancient City

内容提要 苏州城是否为春秋晚期吴大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2000 年对灵岩古城及其邻近地区同时代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从科学的角度提供了佐证。结合过去文献资料及对苏州城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再一次论述了春秋吴大城应为灵岩古城,而苏州城始建于汉代。

关键词 苏州城 春秋晚期 吴大城 灵岩古城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苏州城是否曾是春秋晚期吴都的问题,首先提出质疑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东南文化》上刊登的《春秋时代吴大都位置新考》、《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及《吴大城与列国都城比较》等文章,提出了苏州城不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吴大城。10 多年过去了,随着对古城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古城址认识有了新的提高。2000 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的同志在航测图的启示下,终于在灵岩山侧发现了面积甚大的春秋时期城址遗存,并在同年苏州博物馆与吴中区文管会联合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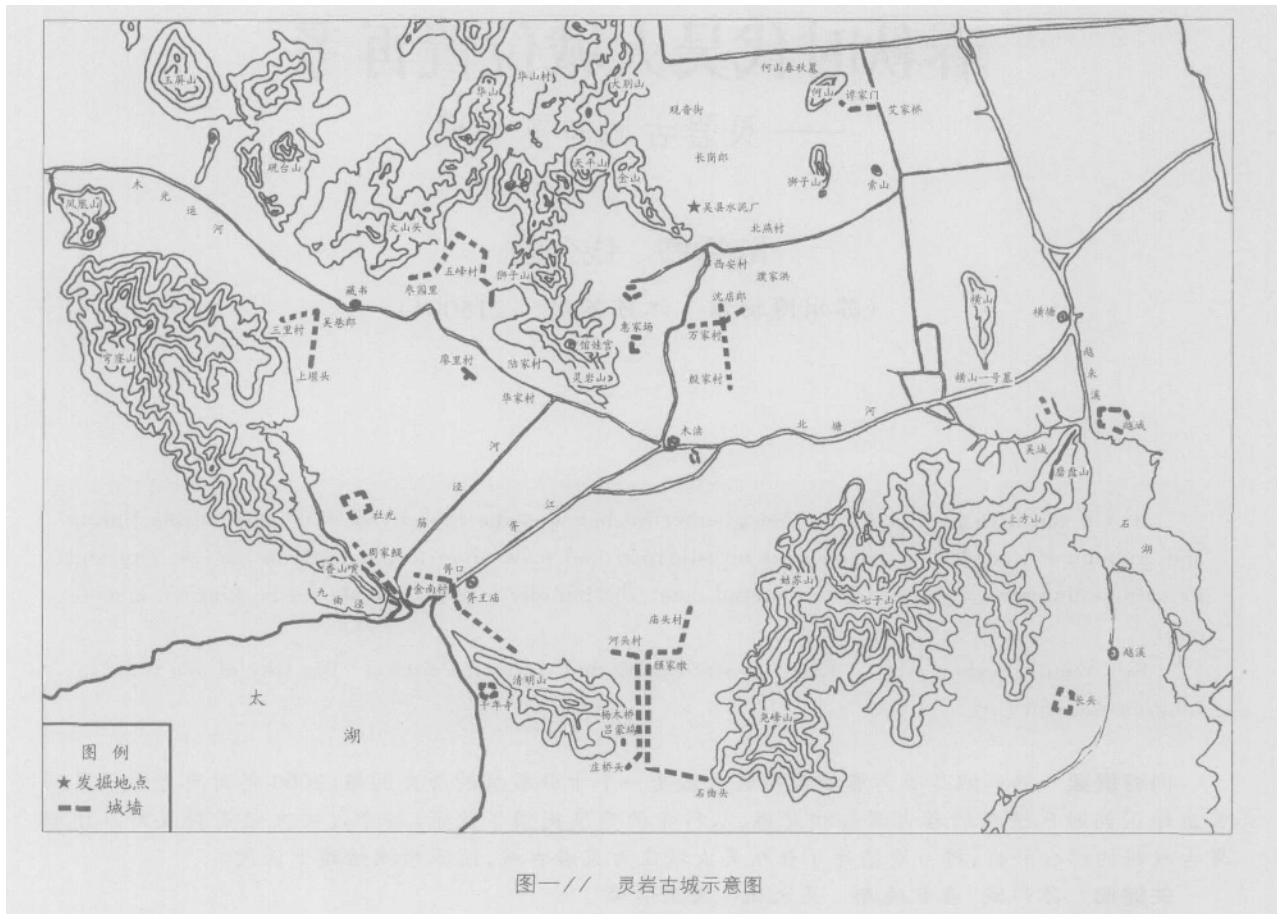
通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及局部的试掘,第一线的考古同志先后对其成果进行了研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论文、报告等,较详实地介绍了对这次春秋灵岩古城的情况,对古城的认识发表了一些见解,并于 2002 年 11 月召开了苏州西部山

区吴文化考古专家论证会^[1]。

但是,苏州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传统的观念束缚着对科学的探索。随着苏州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如何来保护这古城遗址,迫在眉睫。当然,首先是对春秋灵岩古城进行的全面勘探、发掘,这必将影响西部开发。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不揣谫陋对灵岩古城的重要意义及其与苏州城的关系作进一步的阐述,以作芹献。

一 苏州城与灵岩古城

要了解苏州城的形制,首先就要来看南宋绍定二年(1229 年)的《平江图》。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苏州城实录,是最能反映古代苏州城形制的地图。根据《平江图》,宋代平江城南北长约 4.5 公里,东西宽约 3.5 公里,城垣周长约 16 公里,呈长方形,城墙略有屈曲。开设阊、盘、娄、齐、葑 5 座水陆城门。整座城市被外城河环抱,城墙内有护城濠。当时为确保城市的安全,不开胥门。但在胥门



的内城墙下,建筑了一座豪华的宾馆,即著名的姑苏馆,以接待外国使臣。在原胥门城楼上,建有姑苏台,登台可以眺望城外景色。在城内四隅置有军营,驻重兵防守。

城内布局严整、规范,有水陆两套交通系统,形成了双棋盘形的格局。城内河道交叉纵横,计有20条主要河流,其中6条河流纵贯南北;14条河流横越东西,据图估测,总长度约82公里。与此相适应,城内有20条大街,最著名的是纵贯南北的交通要道“大街”(今人民路)。在骨干陆道上又派生出众多的坊、巷和里弄,全城计有61个坊,264条巷,24条里弄。

平江城内设有“子城”,位于城中央略偏东南,为平江府衙署所在地,是一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墙外有城濠环绕。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苏州城形制基本沿袭了宋《平江图》的原貌,仅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制和修筑。

灵岩古城群则在灵岩山侧的木渎盆地,包括胥口、木渎、枫桥、横塘、藏书、横泾、光福等乡镇山地和平原(图一)。在上述考古人员的试掘、调查的

文章及作者亲赴实地勘察后,综合起来分析其遗址^[2],发现多处类似夯土城墙的长条形土墩,一些河道沿土墩一侧分布,残存的城墙遗迹如下。

西面保存尚好的有两处。一处藏书镇三里村东侧,由下庙前经吴巷郎折向西至三里村与穹窿山相连,残宽10~20米左右,残高0.5~1.0米,长约600米,下庙前至吴巷郎的土岗外侧有河,宽约10米左右。另一处在藏书上堰头,南北走向,宽2~15、残高0.5~1.6、长约220米,土岗内侧有河,宽约10~20米。

南面保存较好的位于胥口,从香山嘴东侧向北经周家瘳折向东,经金南村、胥口镇又折向南与清明山相连接。土岗宽约10~20、残高0.5~1.0、总长度在1400米左右。

东面保存较好的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处经木渎河头村向北折向东至庙头村,宽约20、残高2.5、长约600米,此处土岗转弯处可能为一城门遗址。另一处从木渎殷家村西侧向北至万家村东侧,宽约20、残高0.5、长约800米左右。

北面东段发现藏书镇陆家村、华家村两段。陆

家村段,残高1、宽20、长约120米。华家村段,残高0.5、宽20米。西段受后期严重破坏,较清楚的仅藏书枣园里一段,宽20、残高1、长约350米。

根据地形,山与山之间豁口处很有可能存在城门遗迹。如:木渎河头村北,大城、郭城之间通道与大城的连结处有缺口,可能是大城的东南门,缺口宽20~30米。胥口香山嘴与清明山之间,可能是大城的南门所在,胥口镇胥江上可能设有水城门。在胥口金南村,大城城墙空缺一段,可能是大城南门遗址。

藏书镇南城郭之间通道墙与大城墙交汇处的吴巷郎可能是大城西门遗迹所在地。

藏书镇吴家场西土岗有一段宽约50米的缺口,有可能是大城北门遗迹所在。

在这些城垣遗存内,分布着大量的大小不等的类似夯土基土墩,大部分可能是夯土台基,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平面形状大多是呈长方形,且顶部较平整。如:藏书寥里村南于巷村东有一长方形台地,长260、宽120、高1.5~2.8米。在其西、南侧有长条形土岗,可能是台基外侧的围墙遗迹。西侧土岗宽10、高2.1、长80米,南侧土岗宽10、高2、长270米。

藏书美荣桥苏福公路两侧分布有两块面积较大的台地。北侧台地长90、宽50、高1.7米,南侧台地长90、宽60、高1.2米。

藏书镇西山村南一台地,平面呈方形,坐北朝南,南部凸出,凸出处似房基台阶。台地边长60、高1.5米。

木渎镇古巷郎西一台地,坐东朝西,呈方形,西部凸出,凸出处似台阶。台地边长50、高1.3米。

从上述点滴的遗迹在航测图上逐一标明,对于灵岩古城的范围有了个端倪。结合其位置、地理环境分析,苏州城与灵岩古城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址。到底它们谁是春秋时代的吴大城呢?

二 历史文献上的分歧

灵岩古城的发现在学术界、社会上引起了争论。传统的观点认为,苏州城即阖闾大城,是吴国在阖闾元年筑的都城所在地,城址2500多年来一直延续,没有变化。实际上,关于吴都的位置在历史上已存在相左的意见。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载:“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

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阖闾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先后出现的城门名称为阖门、娄门、平门、蛇门、巫门、地门、近门、胥门、齐门等。

《吴越春秋》主要记载了阖闾建城的时间(阖闾元年)、原因、目的等,对于城的具体情况,交待甚略:“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关于城门,只出现了阖门、破楚门、蛇门和望齐门。

晋人左思《吴都赋》:“郭郭周匝,重城结隅。”

而从唐宋以来记载的吴大城则以肯定的语句表达吴大城就是现苏州城。

唐·张守节《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曰:“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唐·陆广微《吴地记》中记载“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大城周回四十五里三十步。小城八里六百六十步。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对城门叙述尤为详实,“西阖、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不开东门者,为越绝之故也。”在当时,春秋时代的阖闾城与苏州城显然被认为是同一城址。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云“及阖庐立,乃徙都,即今之州城是也。”又“阖庐城,即今郡城也。”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吴王阖闾西破楚入郢,北威齐晋兴霸,名于诸侯,筑大、小城都之,今州城是也。”

范成大《吴郡志》中亦有类似说法。

从上述文献记载发现唐宋以前和唐宋以后描述的吴大城仿佛是两个城,似乎不相吻合,表现如下。

1. 城的形制

我们来看《越绝书》中:“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如果把以上四面之长度相连,则出现一不规则四边形,周长以古制360步=1里、6尺=1步折算,即为三十七里一百零一步,这与“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不符,其误差为十里一百零九步二尺。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古人计算有误?然而从我国古代发达的度量衡历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前的商、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尺”等长度单位了,

更不用说近千年后,如此简单的算术岂能出错?是否有其它原因呢?

再看《吴越春秋》:“大城周回四十七里”,二者所述城周四十七里似乎较为相符。笔者认为,《越绝书》应成书于先秦时期(据说为子贡)^[31],东汉袁康、吴平只是加以整理,它也许能真实地反映吴大城的原貌,而《吴越春秋》的著者赵晔约为东汉建武年间人(25~55年),当时吴大城很可能已见不到,因为在此之前,越人灭吴时“入其郭,焚其姑苏”^[41]。“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坏诸侯郡县城”^[51]。此后再经过200余年的变迁,恐难以觅迹。所以正如钱培名在《越绝书·札记》中言“赵晔《吴越春秋》往往依傍《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大城周回四十七里”主要还是根据《越绝书》,而对城的规模、布局等都一笔带过。

那么,无论是《越绝书》还是《吴越春秋》中的周“四十七里”,笔者认为,应该是城之形状为曲线组成的不规则四边形。而四面相加之“三十七里”,则是根据每边之长以直线距离所得,这足以说明实际之吴大城形制应该为较为曲折的不规则形状。

其实,这种不规则的四边形都城,在当时列国都城中是相当普遍的。如赵国都城邯郸古城可分为“赵王城”和“大北城”两个部分,二者相距80余米,皆呈不规则形状;齐国都城临淄故城包括大、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延伸至大城西南隅,两城衔接,都呈不规则形,有的城墙呈直线,有的沿河岸呈曲折状,城墙的拐角就有24处;楚国都城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0米,南北宽3588米,宫城在大城中;邾韩故城,城址略呈不规整的长方形,分西城和东城两大部分,中间还有隔墙;中山国都灵寿故城,则是利用天然屏障筑城,城墙依自然地势蜿蜒曲折,故平面形态极不规整,略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另外灵寿故城、燕下都故城也可分为东、西两城,城址形制不规整……它们建城都是因地制宜,以山川作为天然屏障而为之。

然而,据宋《平江图》所示的宋代平江城呈长方形,较为规整,这与上述文献中春秋晚期的吴大城形制显然相差极大。

2. 吴大城的位置

事实上关于苏州城不是吴大城的观点,早在宋代已出现有相悖意见。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城邑》载:“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非也”。馆娃宫,《吴地记》中说:“吴王阖闾置亭,东二里有馆娃宫,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灵岩

山是也。”《吴郡图经续记·卷中》硯石山条:《越绝书》云:“吴人于硯石置馆娃宫。……即灵岩寺也。”即今之苏州城西灵岩山上即是,可见馆娃宫在灵岩山上。再者,灵岩山地处冲要,“尝登灵岩之巅,俯具区,瞰洞庭,烟涛浩渺,一目千里。”^[61]山前十里有采香泾,又名箭泾。山下有木渎大镇,传说春秋末越王勾践为误吴而输木于吴,使吴王得以修建姑苏台,木塞于渎,故名木渎。木渎西十里为胥口,通太湖之出口,南侧为胥山,北为香山,两山对峙,气脉相联。香山北连穹窿,南濒太湖。穹窿为群山之冠,山峻而深,形如钗股,突为吴郡之冠。胥山又名皋峰山、清明山,和尧峰山呼应,尧峰山紧挨七子山,接上方山,古称横山,“临吴控越,实吴时要地。”^[71]灵岩山背依天平山、五峰山。五峰山和穹窿山相吻。灵岩东顾笔架山(现名黄山),两山之隔有金山、狮子山、何山、索山等小山。姑苏山在七子山北,因上有姑苏台而得名。

这一区域真可谓“群山怀抱”,更有河泊纵横,采香泾东北派出灵岩,西南流出香山。《姑苏志》曰:“三江之外,其支流一派东出香山、胥山之间,曰胥口。胥口之水,自胥口桥东行九里转入东、西醋坊桥,曰木渎,香水溪在焉。又东入跨塘桥与越来溪会,曰横塘。由跨塘桥折而南,为走狗塘,荷花荡在焉。”《吴郡志》曰“走狗塘,吴王作”。

在这一带,如以灵岩山为起点,滨太湖,扼冲要,山环水抱,形成一处环状的半封闭式的天然屏障。《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当年阖闾建城于此也理所当然。

3. 宫城与城郭

那么,在《越绝书》中还可曾提到:“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十二里……”“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吴越春秋》也有:“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等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考古工作人员对灵岩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调查、试掘后认为,在苏州城西南的丘陵、山地中,发现了面积甚大的灵岩古城遗存,其中应该还存在大城、宫城、郭城三重套城的现象(图一)^[81]。

如环灵岩山,沿郁家山、金山、家唐山东侧,最后与肚皮山相联,为不规则形,形成西、南、东三面城墙,北部靠山,以山为险要,可能为宫城。

西墙仅发现木渎狮子山西侧一处,分三段。从狮于山西侧斜向西北,又折向北,又折向西,总长

约1000米,残高近2.5、宽20米左右。最北面一段的中间有一个豁口,可能是城门遗址。

南墙发现藏书镇陆家村、华家村两段。陆家村段,残高1、宽20、长约120米。华家村段,残高0.5、宽20米。

东墙保存最好,沿木渎灵岩街向北,经高家场、惠家场折向东,又经万家村、江头郎折向北呈弧线,其间经过沈店郎、濮家浜、西安村、北燕村和新经浜,又从吴县水泥厂折向北,经木渎梅思弄及枫桥镇、柳家郎、长岗郎、新桥头、三家村、观音街,随后折向西北,与肚皮山相连。沿途很少缺环,土岗宽20、残高0.5~2.5、总长度约6600米。

还有一城位于灵岩山东侧,由经过木渎苏江郎、江头郎、濮家浜、西安村、北燕村、南洪的土岗围成半圆形,土岗残高0.5~1.5、宽20、总长4000米左右。

根据木渎盆地周边形势及文献记载的吴大城郭城长度,木渎盆地四周环绕的山脉很可能是吴大城天然的郭城,吴国很有可能利用这种有利地形,在山与山之间缺口处补筑郭城墙,并在低矮的山头加筑城墙以护围大小城。但在尧峰山与果峰山之间,从木渎庄桥头到石曲头,断断续续有类似郭城墙的长条形土岗存在,宽约50、残高约1、残长300米左右。在郭城墙与大城之间,有两条南北向平行的土岗相联结,构成通道,通道从木渎塘角头向北,经张家村、顾家墩至河头村与大城相连,保存较好的有胥口吕蒙坞东侧、木渎杨木桥东侧、河头村西侧3处。吕蒙坞东侧通道,东侧墙保存较长,两墙相距340米,西侧墙宽10、残高0.5、长90米,东侧墙宽10、残高0.5、长近300米。杨木桥东侧段仅保存一段东侧墙,宽10~15、残高0.5~1.5、长260米。河头村西侧段,两墙相距较近,仅20米,西侧墙宽15~20、残高2、长240米,东侧墙宽15~30、残高1~3、长380米。在顾家墩村西南侧,通道由窄变宽,东侧墙被破坏,西侧墙向西南延伸,与皋峰山相连,宽10、残高0.2~0.5、长200米。

胥口香山与清明山之间的郭城沿胥江两侧分布。西侧从太湖边向北直至胥口周家窰与大城墙连结,宽5~50、高0.5~1、残长420米,东侧从清明山北侧向西北至胥口王庙与大城墙相连,宽10、残高0.2~0.5、长900米。胥口西侧城墙可能是连结郭城与大城的通道的东侧墙,通道西侧墙依托香山嘴。

藏书镇吴巷郎西侧到三里村一段土岗可能是

吴大城西部郭城与大城的通道墙,墙宽10~30、残高0.5~1.0、长220米。

在华山东侧枫桥华山村有一段东西向长100、宽30、高1米的土岗,可能是吴城西北部郭城的一部分。

何山东南枫桥艾家桥至谭家门,有一段长450、宽10~20米的土墙,可能是吴大城的东北部郭城墙的一段。

但我们认为,文献记载的吴郭“六十八里六十步”,还应该从吴城起的磨盘山、上方山、七子山、尧峰山、清明山、香山、穹窿山……依山而筑的天然屏障,而发现的多处城垣,它们应是吴大城的城墙,尚可能为伍子胥城,或者另外的其它城址。如磨盘山上吴城呈一字排开,可能也是郭城的一部分,因山势较低,在山脊上另筑城墙护围。吴城总长度为500多米,高2~3、宽10~20米,与分布在山上的土墩石室相连。

可见,上述之天然屏障确实和《越绝书》中的“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有着内在的联系。其理由是:如《国语·吴语》云:“入其郭,焚其姑苏。”那么,姑苏应在郭中。《越绝书》中:“放山者,在苻碓山南,……内郭中,名通陵乡。”苻碓山,故名鹤阜山。“鹤阜山亦名苻嵎山,即狮子山。”^[9]所以狮子山南也应在郭中。又“香水溪,在吴故宫中。”^[10]说明木渎也应是吴故宫之所在地。再,“吴西界有华山,可以度难。”^[11]华山,“故又名天池山,在灵岩山西北。”^[12]实为天池山之东片。这些史料似能说明吴郭的位置就在这一地区。而且上述天然屏障的内围长度又与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的长度也是较相吻合的。另,朱长文书中所记“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的流俗之说正说明吴之故都恰在郭中。而且馆娃宫所在地灵岩山上有吴国时期的胜迹月池、砚池、玩华池、琴台、响屐廊等,下有石室,俗传为吴王囚范蠡之地。

《吴郡志》云:“姑苏台,在姑苏山。”宋·周必大《壬辰南归录》云:“姑苏前后二台,相距半里,俗云拜郊台,为城三重,遗基俨然。”《国语·吴语》:“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姑苏台显然在郭中。《越绝书·吴地传》:“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苏之台,以望太湖,中阙百姓。”可见,姑苏、姑胥非为一台,一在姑苏山,一在胥山(又名皋峰山,清明山),均在吴郭中。这里,灵岩、姑苏和胥山三峰鼎立,互为倚角,居高临下,遥相呼应,吴王因地制宜利用丘峰作高台建筑的台基,在其上建筑宫殿,灵岩山

一带就是吴小城的宫殿区。胥山旁传言有伍子胥宅及其墓,且胥口为水道之咽喉,地位险要,伍子胥城或亦在胥山周围。灵岩山、姑苏山、胥山之间的山间盆地,土地广阔而较平坦,交通便利为四达之地,内能受三个制高点的控制,外有天然屏障——郭的保护。

正所谓“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坎卦彖辞》)“郭,则以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垣也。”^[13]也与“郭郭周匝,重城结隅”的说法相符。

而苏州城的外围却从未发现过“六十八里六十步”的郭城,也没有宫城之说。其本身位置在太湖之东北。唐以后的文献上也未提到过阖闾大城之郭。虽然在1984年4月城西北4公里左右金家村唐墓出土的墓志上写有:“……葬于离郭西北九里其祖茔……”,另一唐墓志上也有:“郭东六里”等,但此处涉及到的“郭”就是当时苏州城的城墙。

这些确定能够说明,文献记载中的吴大城,在唐宋之前和之后不应该是同一个城,前者应为近期发现之灵岩古城,而后者才是现在之苏州城。

三 考古调查、试掘、发掘材料的对比

1. 城墙

城墙是建城的标志,因此我们再从对城墙的发掘来了解当时筑城的方法。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为抗越而筑城,在越城的对面利用山,筑一山城。《吴县志》曰:“(吴城)在横山南,越来溪西,吴王控越之地,横山山旁,冈势如城郭状,今犹隐隐然。”现南面城墙轮廓已不太清楚,仅是一些残垣痕迹可辨。北面城墙,轮廓清晰,依山而筑,仍保存有六七米高,城墙以山为基础,如逢山凹处,就全用夯土作基堆筑。在1983年进行了试掘,在试掘段城墙,残高4.15米,全为夯土堆积而起,夯土层中有圆形夯窝,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片和小件石器等。这些夯土层,土质坚硬,结构紧密,层次分明,一直向西沿山脉走向蜿蜒600余米^[14]。

那么,灵岩古城的城墙内涵又是怎样的呢?苏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于2001年3~6月分别对藏书镇五峰村古城墙、木渎新华村城墙和木渎金山村古城墙进行了抢救性的试掘。通过对个别城墙的解剖,张照根先生在《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一文中介绍得相当详细。

藏书镇五峰村古城墙位于苏福公路北侧的大焦山与五峰山之间,呈东西走向,中部向北凸出,现存总长度约2000米左右,城墙最高处高出地面约4米左右。城墙底宽20米,横截面呈梯形,上窄下宽。近4米的堆土层系层层夯筑而成,土质坚

硬,颗粒细小,夯层明显,夯层厚5~30厘米不等;城墙北半部使用了版筑技术,使城墙的斜面更加整齐坚固。从宋代层以下近4米的夯层内,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印纹硬陶片及磨制石器。陶片多为红褐色,均为手制,内外凹凸不平,但火候极高,烧成温度达900℃左右,表面拍印绳纹、方格纹、曲折纹、篮纹等纹饰以及各种组合纹饰,纹饰风格整齐,明显为春秋晚期特征。石器种类有刀、斧、凿等,大多为经过使用的残件。

木渎新华村的古城墙位于灵岩山东侧,大致呈东西走向。试掘地城墙残存长度不足30、高2米。通过解剖可知,春秋城墙厚约1.5米,夯层中出有少量春秋晚期几何印纹硬陶片及夹砂红陶片,并有少量残石器出土。夯层走势平坦,厚10~40厘米,土质坚硬,颗粒极细小,夯土中很少见到砂粒。城墙底部宽15米左右,在城墙底部两侧生土上各开挖条宽约0.5米的基槽,槽内填满青灰色淤泥,土质细腻坚硬,起到加固整个城墙的作用。

木渎金山村古城墙位于金山东侧,呈南北走向,试掘点位于梅家桥西金山浜小镇北,测得此处城墙宽25、高4米,从下至上包括春秋、唐及明代三个时期的夯土城墙面,其中春秋城墙残存1米,唐及明代城墙厚3米。夯土质地坚硬,夯层走势平坦,夯层厚5~50厘米不等。春秋城墙内出土了较多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及夹砂红陶片,并有少量残石器及原始瓷片。从陶片的纹饰特征分析,属春秋晚期遗物。

这些都与吴城城墙的堆筑方法是一致的,年代也是一致的。

而苏州城的古城墙,目前尚存2700多米。随着解放后开拓交通,拆除了部分城墙,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尤为严重。苏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对苏州古城墙的内涵作了一定的调查、试掘和发掘工作。在苏州城的东面相门北(动物园)城墙中出土了唐白瓷碟、六朝青瓷钵及四系罐等遗物;南面盘门附近的城墙剖面上发现厚达18~20厘米由杂物、散砖瓦夯筑的层次,内包含汉、六朝、唐、宋、元、明各时代的陶瓷残片,中间还有许多宋代的条形砖,并发现宋代的石基础,在宋代条形砖铺的路面上还发现铁箭镞;1970年在城西的胥门城墙中出了铜箭镞和六朝青瓷盂,1984年4月在胥门北桥东31米处开沟时发现了离地表1.13~1.4米有20米厚的夯土层城墙,土纯呈黄色。另外城西的阊门附近及北面城墙内均

发现六朝时期的墓葬及遗物。

其中最能说明城墙结构的是1975年8月~1976年7月对650米平门城墙进行的发掘^[15]。城墙的堆积为:

第一层:深0~0.15、厚0.15米,为表土层。此层是现代道渣路。

第二层:深0.15~1.3、厚1.14~1.2米,为黄土层。此层土质黏、软,含有少量碎砖块,土层中发现汉代碎筒瓦1块。在深度为0.9米处发现砖石城墙基建筑。从砖来分析,可能为宋代城墙遗迹。另在东南面石基外侧(靠内城河处)发现有唐宋时的陶器残片。两石基内宽10.7米。石基为条石所筑,堆积较整齐(六朝及唐代墓葬均在此层中发现)。

第三层:深1.3~2.82、厚1.3~1.52米,为夯土层。土质细而纯,又很坚硬,用夯打实,层次平整。共计17层,每层厚度为8~10厘米。同时在地面上有大量夯窝,呈圆形,直径约分别为4~6厘米。夯土层中没有遗物、遗迹发现。

第四层:深2.82~3.87、厚0.55~0.84米,为灰锈土层。土层中含有大量铁锈质,土质坚硬,无遗迹、遗物发现。

在17层夯土层之上,发现了32座六朝墓,瓮棺葬6座,唐墓2座,六朝墓中主要有青瓷器、铜器及一些金银饰物,唐墓则有墓志铭和陶瓷器,铜器出土。

更如东部振亚厂城墙,在城墙下发现战国时的灰坑,在西北处发现城墙下有战国时的土井等。

其余对城墙的调查、试掘数量甚多,较为零散,不一一赘述。这些都反映了苏州城墙是苏州历史的寒暑表,从整个城墙的发掘、发现中,城墙内出土的最早墓葬为三国时期的,也就是说从三国时期开始苏州城墙开始沦为墓地,一直延续到唐代。当然这一时期对城墙也有重修或破坏,一直到了五代才开始出现砖砌墙壁。

史载,五代梁龙德二年(922年)钱纛以砖砌苏州城,高2丈4尺,厚2丈5尺,里有外壕,这是记载中最早的砖城。后几经破坏重建,其中以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侵为最。直至绍定二年(1229年)郡守李寿朋重建,苏州城重新定局,留下了四大宋碑之一的《平江图》。

德祐元年(1275年)元朝入侵,“城池悉命夷堙,故民杂居遗堞之上”。苏州古城再遭毁灭性破坏。

此后,几建几毁,随着历史的发展,城墙的功

能在逐渐衰退,但城址始终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灵岩古城的城墙年代为春秋晚期城墙,而苏州城的城墙则晚于战国而早于三国,应该是汉代。

2. 城门

1978年8月,在城北疏通齐门西侧入城河道及建筑泵房的工程中,发现了齐门古水城门的基础,从出土遗物和对其中出土的木块进行同位素碳14测定,知其建筑年代为宋代^[16]。

1980年12月,在城东相门旁疏通河道,在相门大桥西堍南侧28米处发现了古水门遗址。遗址长14、宽8米,底部离地表4.83米,整个遗址几乎全部是用原木和大型木块平放堆筑而成。水门基础建筑在呈青灰色的土层上,其土质纯、硬、细腻,深挖知无任何包含物。其基础由楠木竖横交错堆筑而成,共3层。在中间部上面有2块重达千斤大青石门臼,两石臼之间相距3.18米。北门臼上仅有圆孔,长方形槽各一;南门臼上,门的各种木构件俱全,从而可以看到水门包括水上门和水下门。水下门高72厘米,向内开,南面一扇门保存较完整,长1.85米,四周用铁皮包裹,北面一扇仅存门槌,可以看到两扇门合缝处微内鼓。可知,水是由城内流向城外。门之外有大量的六朝残砖和厚达五层平放的杉木桩。在基础中,底部又发现了大量的灰陶绳纹板瓦、筒瓦碎片,瓦的反面为细麻布纹和素面。仅在门内3米处的基础中发现了一小片填线方格纹几何形印纹陶片。这些数量较多的板瓦及筒瓦都是汉代遗物。其他还有唐代六棱嘴执壶、宋代瓷片及一只漆碗,基本上全部在门内及门外竖桩附近出土。在南门臼外侧为厚达1.60米的用大石块堆砌的高墙,应为水门的石门洞。石块略泛红色,为砂岩。

经过对水城门的基础碳14法测定,如水门第二层木基础的坚木榫钉楠木,距今约2000年,1900±100年实验室编号为BK88088;古水门门臼下的垫木楠木,距今约2000年、2135±80年,实验室编号为BK88089^[17]。这些都说明了相门水门的建筑年代应该是汉代。

相门古水门遗址清理刚结束,正值盘门水门大修作坝堵水。笔者从水门底部破缺的墙洞钻入其内,发现里面许多石块同相门水门石墙的石块是一样的,为砂岩,略泛红色。

现存的盘门古堡、胥门、阊门,从外表砖石看皆为明清时重修,偶尔也能发现一些宋代的条形砖。新阊门、金门为民国时开设。

3. 城内遗址

灵岩古城及周围的宫城、郭城,分布着许许多多的春秋战国遗址,1957年曾发现灵岩山遗址^[18],位于灵岩山南麓的苗圃内,东西长129、南北宽105米,面积达13545平方米。文化层在地表下50厘米,为灰褐色土,质地较硬,出土遗物与邻近五峰山所发掘之春秋遗物大致相似,有编织纹釉陶、方格纹硬陶、泥质和夹砂陶片等。关于此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先生就曾在《史记·越世家注》中阐述过:“苏州木渎灵岩山上俗以为是馆娃宫,余於民国二十五年曾在其处,发现几何纹及绳印纹陶器,是为春秋古遗址”^[19]。同时期的遗址还有金山浜遗址^[20],位于郭内金山乡南浜村,从金山南麓一直伸延到南浜村以南,东面1公里为狮子山。遗址东西长约400、南北500米,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另外还有乌龟墩遗址、新庄遗址、茶店头遗址、星火遗址、华山遗址、宝山遗址、张墓村遗址、吴城越城遗址、吴宫桥遗址等^[21]。同时在吴郭的山脊、山坡上有数以百计的土墩石室,出土的零星遗物不胜枚举。这些吴地春秋战国聚落遗址反映了当时吴国都城的盛况,而在灵岩古城东北的大片西高东低的山麓冲击扇地带,却以大量的春秋战国墓地为主,其中真山墓地最为突出,经发掘整理者的分析研究,其墓主为第一代吴王寿梦之陵墓^[22]。在真山西侧2公里,严山曾出土大量吴国王室玉器^[23],其性质当为窖藏,后经研究提出应为吴国最后一代吴王夫差之陵^[24]。另在真山附近的树山、阳宝山以及何山一号墓、虎丘东周墓等,都反映出这一片山地区域应为吴国王陵区及贵族墓地区域。

多年来,在苏州城内基建施工中,于地下发现的遗迹以及苏州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对城内一些文化遗存的调查、试掘和抢救性发掘来看,先秦的遗址也有零星分布,如出土春秋晚期青铜器的新苏丝织厂、相门三监和葑门程桥窑藏等。再如公园遗址^[25]、蒋园遗址等,玄妙观遗址、钟楼村遗址、以及在三元坊一带、察院场至东吴丝织厂一带、南园等地,都发现零散的战国遗物,但没有形成文化层^[26]。而位于城外的陆家村遗址、青瘠地遗址、西塘河遗址、新庄遗址等,其中最大的为西塘河遗址^[27],南北长达2公里,发现战国井200余座,出土大量的乳钉足黑衣陶壶及印纹陶器,面积达20000余平方米,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说明在现苏州城周围一带,不仅包含从西部迁徙过来的聚落,而且原在东南部沿湖河旁分布的聚落也向西、北推进。人口

的相对集中,无疑对此地的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应该说,这此聚落的相对集中,便是以后苏州城出现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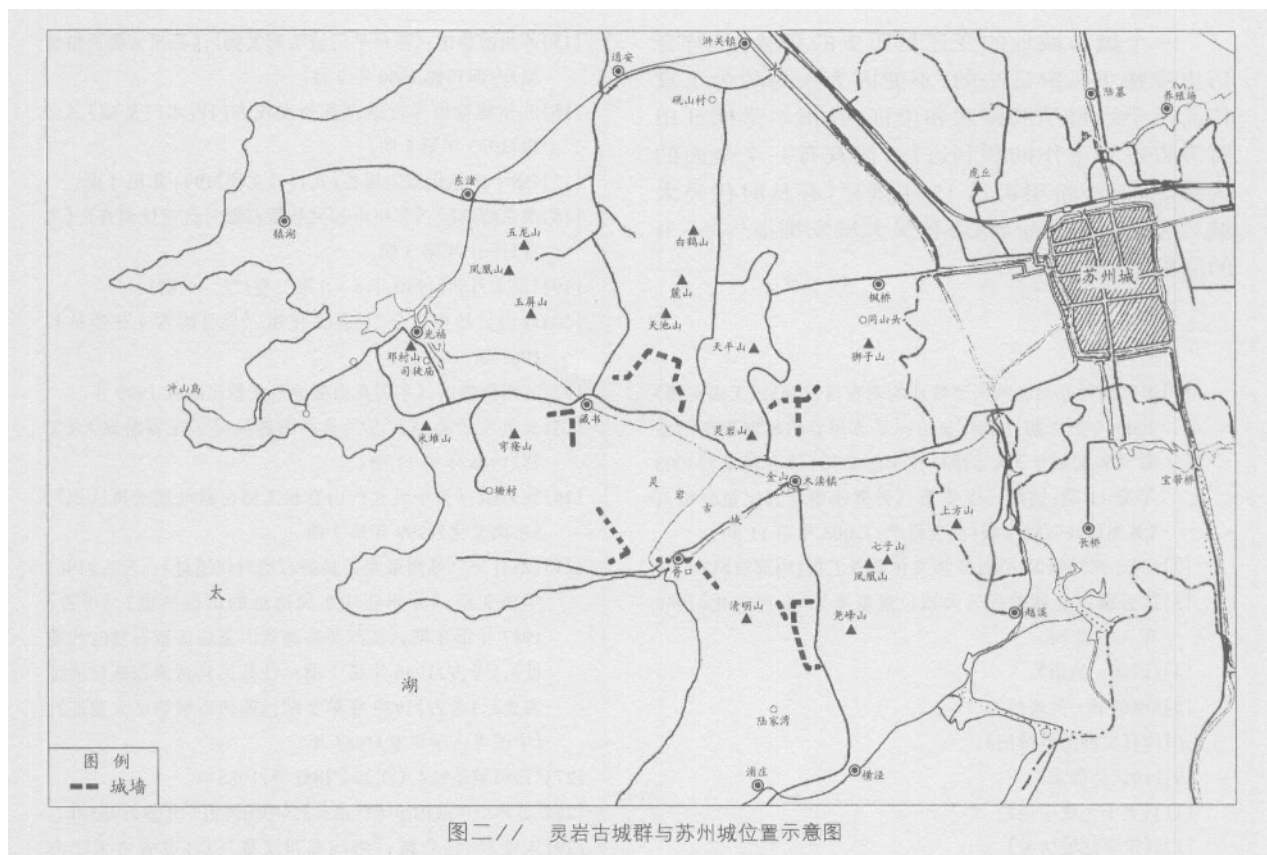
而在大部分城区的地表下总能发现有一层含铁锈斑的黄土层,里面包含五铢钱、筒瓦、板瓦、卷云纹瓦当、釉陶壶、罐、纺轮、厚胎的红陶罐和饰方格纹、米筛纹、组合纹、填线方格纹、席纹的几何印纹陶器。这一层是汉代的文化层,其中以道前街遗址、盘门三景遗址和东吴丝织厂遗址出土的汉代遗物最为典型^[28]。道前街南侧的汉代文化层最厚处达2米。城内汉代文化层互有联系,例如道前街的东西近1000米的剖面上汉代文化层没有中断。大量的建筑材料筒瓦、板瓦、瓦当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大量建筑物的存在,而且,最关键的是汉代文化层大部分直接叠压在生土层上,并出现大量水井,例如原金星糖果厂、大公园、报社、道前街、人民路、察院场、苏州大学、盘门内、光明丝织厂、新苏丝织厂、博物馆、染织三厂、塑料十一厂、丝绸印花厂、仪表厂等数十处多有汉代陶圈井发现,分布相当密集,和春秋战国时期遗迹和遗物呈零星分布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材料有力地说明,苏州城在汉代确已初具规模。

城外的大量汉墓为说明汉代苏州城的确立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在苏州城的四周,汉墓星罗棋布,较著名的就有娄葑乡的高山墩、天宝墩、青瘠地、长央坟;横塘乡的凤凰墩、鸳鸯墩、双桥墓地、冶金厂墓地;虎丘乡的高邮墩、长凳坟、新庄墓地、王妹妹坟;长青乡的孙坟头、白洋湾墓地等^[29]。小型墓葬难以计数。大批的汉墓在苏州城近郊被发现,在城墙边发现少量东汉晚期墓,这说明汉代苏州城已成为一座政治、经济和居民生活的中心,而当时居民的墓地安排在城外。

四 灵岩古城和苏州城的关系

通过文献史料的对比、分析及考古材料的佐证,充分说明了灵岩古城和苏州城不是同一时代的城址。

灵岩古城是春秋晚期的城址,从目前调查的城址范围,尤其是从城墙、地理环境、位置、同时代遗址及一批大墓的出土,应该说和《越绝书》中描述的吴大城,也就是阖闾大城相一致,是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建都,至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前后共历41年。即文献史料和考古调查、试掘相吻。更如《吴都赋》云:“郭郭周匝,重城结隅”,说明在晋代,还非常清楚地表述吴都的形态。但对其全面的了解,更需马上进行大规



图二 // 灵岩古城群与苏州城位置示意图

模的钻探、试掘,搞清楚各城址的分布、关系,然后对夯土台进行勘探。进一步对各城址的大规模发掘,才能将吴大城全面的揭示,使吴大城重现。

而苏州城应该是汉代的城址,大量的考古材料完全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置吴郡,现苏州城确立应是当时郡治之所在地,也必为当时实行政治、军事的统治中心。另城内有纵横交叉的排水系统,城外有环城的河濠,连接三江五湖……

这说明了灵岩古城与苏州城有着递嬗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普遍的现象。如古城西安,最早应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丰、镐,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各个时代的城址具体位置不尽相同(丰、镐两个城址就相距约10公里,其它彼此相距20~30里),城市的位置也有过数次徙移;洛阳,西周的雒邑、东周的成周和汉魏洛阳、隋唐洛阳城址,每个城址之间也相去约10公里^[30],……但这一切都辩明了一个筑城史上很关键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城址都必须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来考虑。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

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制内,又利于防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交通便利。当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都城,所以每个时期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最有利的城址,以利统治。就如苏州城在隋代也曾经迁城于横山侧,到唐代又迁回(图二)。

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阖闾造都城于灵岩山侧,完全符合当时军事战争的需要,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纷争,一方面对内,便于统治,一方面对外,抗衡越国,如此规模的都城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而苏州城自汉代建立后,由于地处三江五湖,隅于一方。自六朝以来,北方、中原战乱,使大批门阀士族南迁,在苏有顾、张、王、陆四大族,经济繁荣,使为富庶之地。尤其到两宋经济南移,成为“苏湖熟、天下足”之地。苏州城的军事防御的功能已逐渐退化。历经风雨,几经毁坏,又数次重建,随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手工业日趋发达,直至今日,苏州城还依稀保持着昔日的风貌。它不仅是江南水乡城市建设的一个创举,而且为江南经济的繁荣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个城市城址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不能因为人为的为了宣传而不予以科学的探索和论证。其根本是保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其有一个全面的揭露。我们不希望再过 15 年撰写《春秋时代吴大城三考》,而是期盼着《春秋吴大城发掘报告》一书的问世。

- [1]张照根:《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无锡文博》2003 年第 2 期;姚瑶、金怡:《从苏州春秋晚期聚落形态看灵岩大城址》,《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姚继元、王建华:《吴都地望及其定量分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
- [2][8]苏州博物馆 2000 年吴文化调查汇报(内部资料)。
- [3]钱公麟:《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东南文化》1989 年 4/5 合刊。
- [4]《国语·吴语》。
- [5]《越绝书·吴地传》。
- [6][7]《吴郡图经续记》。
- [9][10]《吴郡志》。
- [11]《老子·枕中记》。
- [12]《东平江城坊考》。
- [13]吕思勉史学论著·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 [14]《苏州市吴城春秋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

- [15]苏州博物馆:《苏州平门城墙的发掘》,《苏州文物资料选编》内部刊物 1980 年 9 月。
- [16]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发现齐门古水门基础》,《文物》1983 年第 5 期。
- [17]《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九)》,《文物》1994 年第 4 期。
- [18]南京博物院:《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 年第 3 期。
- [19]《说文月刊》1940 年 5~6 第二卷(二~三期)。
- [20]政协吴县委员会、吴县文化馆:《吴县的古文化遗址》,1963 年。
- [22]苏州博物馆:《东周真山墓地》,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 [23]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严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 年第 11 期。
- [24]钱公麟:《关于吴县严山春秋玉器窖藏性质的再认识》,《东南文化》1999 年第 2 期。
- [21][25][26]《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 年第 3 期;《苏州新庄东周遗址的试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4 期;《江苏吴县高景山茶店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 年第 7 期;《江苏吴县越溪张墓村遗址调查》,《考古》1989 年第 2 期;《苏州市横塘星火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
- [27]《西河塘遗址》,《江苏文物综录》1988 年。
- [28]《苏州市内战国至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
- [29]朱薇君、钱公麟:《略谈苏州汉墓》,《江苏省考古学会 1982 年论文选》(内部资料)。
- [30]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 考古资讯 ·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成立揭牌

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物局研究决定,报经江苏省编制办批准,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为基础,正式成立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2006 年 9 月 15 日,“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暨江苏省考古工作座谈会”在南京博物院举行。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为“江苏省考古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会议由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主持,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王慧芬和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作了大会致词和发言,省内各市文化局、文物局分管局长、文管办主任、博物馆馆长、驻宁高校代表及相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王慧芬副厅长作了重要讲话,她说,成立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将有益于我省考古资源的整合,有益于全省考古工作进一步的规范化。新成立的考

古研究所承担南京博物院的业务工作和相关研究课题,负责对省内各市、县考古工作的指导,负责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考古发掘项目。

张敏所长和与会人员一同分享近年来全省考古工作的成就,交流考古工作的经验与得失,部署今后工作的重点。新成立的考古所将组织全省考古人员在扬州、淮安、宿迁和徐州等 11 个点进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考古发掘。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省考古工作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制定的《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条例》作为江苏考古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对强化考古工作的科学管理和规范操作,促进全省考古工作的新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盛之瀚)